

一桩并未了结的历史疑案

◇鲁一鸣

墨子里籍问题，一则无文献可查，二则无出土可证，千百年来成了一桩历史疑案。然而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山东大学滕州籍某教授频频来滕州发表演讲，连连发文（见滕州政协《滕州文史资料》）公然判定墨子是滕州市木石一带人。此说出台后十几年来，在滕州形成了一个愈演愈烈的“墨子热”：市领导亲自挂帅，发文件、拨专款、建机构、求题词、建立了“墨子纪念馆”，在火车站广场竖起了墨子铜像，拨巨资建造了“国际墨子研究中心”，在北京召开“国际墨子研讨会”。市委市政府明确行文，“墨子故里”不仅是滕州的宣传名片，而且把宣传和践行墨子思想作为滕州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。为此，又把连当年某教授也明确表态“应是济宁泗水县人”的鲁班也定位到滕州，并为之建了“纪念馆”，又举办了“中国（滕州）首届国际墨子文化节”，而且，把“滕州——墨子、鲁班故里”的广告搬上了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……凡此，给不明真相的世人造成了一种印象：墨子为山东滕州人是定而无疑了，一桩历史疑案就此即可了结了。

然而，果真能断定墨子是山东滕州人吗？

关于墨子里籍问题，历来有宋国说、齐国说和鲁国说。但某教授把其定为滕州，未免武断。主要是没有直接证据。当初激发其提出这一论断的惟一证据是明代万历十三年《滕县志》“鲁国滕县东南（即今之木石）有目台亭”这条记载。他认为为“台”，就是“夷”，“目台亭”就是“目夷亭”，是为纪念宋国的公族目夷君（子鱼）而建。

于是就大胆推论：宋国的公族目夷君曾在山东滕州木石一带生活并“繁衍后裔”，墨子是目夷氏的后裔，所以墨子是滕州木石一带（即当年的小邾国）人。抽象的推理不能取代科学的考证，何况这个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都是不可靠的：如果仅据一“亭”就能断定是为纪念目夷氏在此生活并“繁衍后裔”，那么，不知是某教授没查到还是故意回避——在山东，不止一处仍能查出“目夷”的历史标记，例如临沂市的古《沂水县志》上就明确记载：沂水城南四十里有“目夷台”，这个“台”又是纪念谁在这里“繁衍后裔”的呢？说墨子是目夷氏的后裔，有何证据？这一点连某教授本人也承认“是推测”，故而，他只能引用其老师童书业先生的话：目夷氏，因快说“省为目（墨）氏”，墨子与目夷同氏。然而，这不过都是一厢情愿的揣测而已。再说，同姓氏即为其后裔，这种论断的可信值会有多大？退一步说，墨子果真是目夷君的后裔，也难断定墨子就一定是滕州木石一带人。其一，某教授所说的“目夷”和其后的小邾国，其地理范围难道就一定仅仅指滕州木石一带？且不说临沂市沂水县的“目夷台”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“目夷”区域的所在，就是某教授所说的目夷君，其陵墓就不在今日之滕州，而是在距滕州木石二百多里的山东济宁市的微山岛上。近年来在枣庄市山亭区，还有鲁南地区的考古发现，进一步证明了小邾国也比某教授所圈定的滕州木石一带地域大得多。即使墨子真是某教授所说的是“目夷氏”“繁衍”在小邾国的“后裔”，也不一定就“繁衍”在今天的滕州木石。其二，从目夷君到墨子约有二百多年，正是天下大乱的春秋末期，这中间战乱迭起，百姓四处逃乱在所难免。墨

子的祖辈或父辈逃到他国定居而生墨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就像孔子的父亲从宋国逃到鲁国的陬邑而生孔子，难道能说孔子是河南人而不是山东曲阜人吗？某教授拿姓氏的演变和分布作考证，不知是否注意这样一个事实：目前，在河南省鲁山县的个别地方倒有黑姓、墨姓或类似这类字音的姓氏，而滕州连这类姓氏的影子也没有，难道不能说明点什么吗？

笔者认为，鉴于先秦文献缺乏明确的记载，在探讨墨子里籍问题时，有两部古籍不可忽视。一部是《墨子》，是墨子思想言行的忠实记录，由墨子本人及其弟子和再传信徒写成，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最为可靠。墨子一生到过许多国家，《墨子》中涉及许多国名、地名、人名。滕州东部、东南部地面当时属小邾国，西部、西南部与之鼎足而立的尚有滕、薛二国。它们虽是小国，但其历史悠久，外交频繁不绝于史。特别是滕国，因其为周之同姓，实行“仁政”，被孟子称为“善国”。从年代讲，这三个小国在墨子时代就存在。如果墨子真是小邾人，为什么他的言行会与本国及其接壤的两个邻国无涉，故而《墨子》中找不到邾、滕、薛及其有关的字眼？答案只有：要么墨子的生活与活动与这三国没有关系，要么墨子的家乡本来就远离滕州一带。再者，古人一般是不会“数典忘祖”的，拿目夷子鱼来说，曾为宋国赫赫有名的军事家。如果墨子真是其后裔，墨子的军事言论中为什么不提其祖功呢？仅仅才一、二百年，难道其后代就忘掉他那足以引为自豪的祖先吗？每个读过《墨子》的人都会感到：墨子滞留地离齐、鲁两国都城较近，他常在齐、鲁之南、宋城以北、特别是河南鲁阳一带生活

与活动，在《墨子》中，找不到“墨子为小邾国（滕州木石一带）人”的任何蛛丝马迹。还有一部更不可忽视的《史记》。谁都知道，作者司马迁为了搜集和校正史实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东海之滨。他曾“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……”，深幽访古，追根寻源，尤其是“乡射邹、绎，厄困蕃、薛、彭城”。邹、绎均邻滕州北部，蕃，薛在滕州地面，彭城则是滕州的南邻。司马迁在齐、鲁特别是以滕州为中心的鲁南一带活动如此丰富，而且是“厄困蕃、薛”，时间不会短，对于鲁南，特别是滕州一带的风物人情、古迹遗址、名人逸事是不会闻而不述的。如果墨子真是滕州木石一带人，他绝不会无视这一事实，肯定会在《史记》中留下一笔的。然而，他在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末尾却这样写道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孔子后。”如果按墨子公元前468年出生的话，司马迁距他仅300多年，并在滕州滞留考察过，但他并没有听说墨子的任何传说或逸事，从而断定墨子为蕃（滕）人。不料，两千四百多年后的某教授，驱车绕滕州木石一带转了一圈，最后选了一个叫化石沟的村子，望着山坡上的一座破庙，捅着破庙下的一个石做饮马槽，煞有介事的说道：“就教他（墨子）在这里吧！”这种“乱点鸳鸯谱”式的为古人“安家落户”的考证方法，与司马迁严谨的治史态度相比，真是让人咋舌！难怪陪行的当地人暗自感叹道：教授原来这样考古！

内证不足，求助于外证，诸如语音学、民俗学等，不失为一种考证方法。但如果牵强附会，捕风捉影，甚至伪造证据，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某教授好拿一般百姓不懂的训诂学来唬人，乱改村名、地名、

河名，比如他说“石”、“台”、“沂”与“夷”，古代同音，山川河流和村外镇凡有这几个字或类似这几个字命名者，均为“目夷”之“夷”。于是，“木石”为“木夷”，其境内的沂河为“目夷河”，是“目夷氏”的见证，是“墨”子的见证。从音韵的古今演变来说，最初某些字音相同，也许是事实。但人们不禁要问：距滕州木石一带几百里之外的东邻山东沂蒙山区中的“临沂”、“沂山”、“沂河”，不也是“目夷”的见证吗？如此看来，“目夷”的范围就更大了，墨子出生在何处“目夷”就更难确定。再比如，东夷人爱鸟，小邾国属东夷，墨子名“翟”。某教授说，“翟”是一种凤鸟。此也证明墨子是小邾人。然而。东夷的范围有多大？难道就仅指滕州木石一带吗？事实上，北起辽东半岛，南至江淮下游，都是东夷之人生息处，许多部族都崇拜鸟，故而被称为“鸟夷”。这种仅以人名、地名和字音为据的牵强附会的考证方法一出，当地就有人紧跟逢迎仿效。目前，新编并晋京演出的的地方戏曲《墨子》和一本小册子《墨子的传说》，就把当地的地名随意改动，一律与“目夷”或墨子挂上勾。例如木石附近有座“落凤山”，附会者说，凤落此山，遂生墨子，故命名为“翟”，以为纪念。其实，“落凤山”、“落凤坡”、“凤凰山”、“凤凰岭”等类山名，全国各地有多少！仅鲁南地区就有十几处。难道每座带“凤”的山都要附会一个墨子？事实上，“翟”是一种山鸡，与传说中的凤不是一类。就算是凤凰吧，当地也只有“凤凰不落无宝之地”的谚语，这里的村名、山名、河流名从来与墨子无涉。正如当地群众反映：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从来没听到墨子的传说，难道这“传说”就只往他几个外来人

（指某教授和《墨子》、《传说》的作者）耳朵里传？更奇的是，当地考古工作在滕州木石化石沟村东发现一处乱葬岗，村里人称为“母子地”，有人告知其事，某教授与其附会者，竟然改为“墨子地”，甚至登上了当时的《齐鲁晚报》！

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历史名人，墨子的里籍问题，千百年来，不论是先秦文献，还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甚至近代历史著作，都没有肯定的答案，这正说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严肃认真的态度。然而，某教授千方百计来为墨子在滕州“安家落户”。为了抢先把“滕州是墨子故里”造成既定事实，滕州历届市委、市府以某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依托，把本来的学术研究活动，搞成了一场场政治运动。文化宣传，甚至干部升迁，几乎形成了“以墨子划线”的局面。稍有对某教授观点流露怀疑者，就批之“吃里扒外”“胳膊肘子向外拐”。有一届的一个市委书记行动迟缓了点，某教授与其逢迎者居然向省里告他“破坏文化遗产”；北京一位“学术权威”，还在一次滕州政府举办的研讨会上，还对“河南说”大放厥词，居然以“为什么不争秦桧”的责问向“河南说”者施压，为滕州人张目。故而，难怪有人暗自感叹：“原来历史是一块泥团，有权有钱，想捏成什么样都可以办到。”是啊，为了把这块“泥团”捏成合乎自己的要求，十多年来，滕州人付出了多少又能收回多少？普通百姓是无从知道的。

尊重史实，事实求是，不为权屈，不为钱用，这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也是起码的品格；对现实负责，更要对历史负责；对今人负责，更要对后人负责；对家乡负责，更要对全民族负责，这是一个历

史工作者应有的也是起码的职业良心。人们并不反对研究墨子，宣传墨子，只是那些没有对墨子研究透悟的专家学者和媒体，不要泯灭了自己的良知，对于墨子里籍这一桩历史疑案轻易下断言。